

國學基本典籍叢刊

杜澤遜

審定

宋本尚書正義

一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(唐)孔穎達 撰

宋本尚書正義

第一冊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宋本尚書正義:全六冊 / (唐)孔穎達撰.-- 北京:國家圖書館出版社,2017.9

(國學基本典籍叢刊)

ISBN 978 -7 -5013 -6210 -3

I. ①宋… II. ①孔… III. ①中國歷史—商周時代 ②《尚書》—研究 IV. ①K221.0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218554 號

書名 宋本尚書正義(全六冊)

著者 (唐)孔穎達 撰

責任編輯 張慧霞

封面設計 徐新狀

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(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)
(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)

發行 010 -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
66121706(傳真) 66126156 (門市部)

E-mail nlcpress@nlc.cn(郵購)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→投稿中心

經銷 新華書店

印裝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

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開本 880×1230(毫米) 1/32

印張 45.75

書號 ISBN 978 -7 -5013 -6210 -3

定價 140.00 圓



中華古籍保護計劃

ZHONG HUA GU JI BAO HU JI HUA CHENG GUO

· 成果 ·

《國學基本典籍叢刊》編委會

學術顧問：杜澤遜

主編：韓永進

副主編：張志清

委員：賈貴榮

陳紅彥

王雁行

張潔

黃顯功

劉乃英

《國學基本典籍叢刊》前言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（原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）成立三十多年來，出版了大量的中國傳統文化典籍。由於這些典籍的出版往往採用叢書的方式或綫裝形式，供公共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典藏使用，普通讀者因價格較高、部頭較大，不易購買使用。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，滿足廣大普通讀者的需求，現將經、史、子、集各部的常用典籍，選擇善本，分輯陸續出版單行本。每書之前均加簡要說明，必要者加編目錄和索引，總名《國學基本典籍叢刊》。歡迎讀者提出寶貴意見和建議，以使這項工作逐步完善。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二〇一六年四月

序 言

《尚書正義》二十卷，題漢孔安國傳，唐孔穎達疏。南宋初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。

《尚書》是我國最古老的典籍之一，就其內容來看，《堯典》《舜典》記載上古時期的帝王堯、舜的言行，《禹貢》記載大禹治水的事迹，《湯誓》是商湯伐夏桀的誓師之辭，《盤庚》是商代中期的帝王盤庚遷往殷（今河南安陽）的史事，《牧誓》是周武王伐商將戰於牧野的誓師之辭，《大誥》是周成王平定武庚及管叔、蔡叔、霍叔『三監』叛亂的誓辭，《秦誓》則是秦穆公二十三年秦軍被晉襄公打敗於崤之後，秦穆公的悔恨誓辭。涉及歷史上的虞、夏、商、周四朝歷史。至於各篇寫定的年代，多已不可考，大體上是商、周時期形成的。《尚書》一書的編定時間應在春秋時期，據歷史記載，孔子用《尚書》作教材教育弟子，對該書有編校之功。學術界認為在《尚書》成書之後，仍然有內容的變化，這是早期典籍文本流傳的常見現象。先秦時期，該書的名字是《書》，被多種先秦典籍引用，已經有很大影響。到了漢代，纔有了《尚書》這一名稱。『尚書』的含義，通行的解釋有兩

種，一是東漢馬融的解釋：「上古有虞氏之書，故曰《尚書》。」（孔穎達《尚書正義》引馬融說）二是馬融的高足弟子鄭玄的解釋：「尚者，上也，尊而重之，若天書然，故曰《尚書》。」（孔穎達《尚書正義》引鄭玄說）由於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尊奉《易》《書》《詩》等典籍，所以先秦時期就稱之為『經』。《莊子·天下》說：「丘治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經，自以為久矣。」西漢武帝『獨尊儒術』，儒家經典被國家尊奉為『經』，所以漢人有時稱《尚書》為《尚書經》。如《漢書·云敞傳》：「師事同縣吳章。章治《尚書經》，為博士。」也稱《書經》。如《漢書·律歷志》：「成湯，《書經·湯誓》湯伐夏桀。」又：「武王，《書經·牧誓》武王伐商紂。」宋代以來，《書經》成了《尚書》的又一個通用名稱。

《尚書》不僅是研究虞、夏、商、周歷史的重要史料，也是一些專門學科或學說的源頭性典籍。歷史地理學尊奉《禹貢》，五行學說尊奉《洪範》。禮學中的『喪禮』，在《儀禮》中保存的是『士喪禮』，《春秋左傳》保存了一些諸侯喪禮，天子喪禮則罕有記載，而在《尚書》的《顧命》篇則系統記載了成王去世的禮儀，是研究禮學的重要文獻。《尚書》是我國『政治學』的要典，書中的政治學說十分豐富，可以稱之為『帝王之學』『君臣之學』。《堯典》提出的『協和萬邦』的政治理想，『克明俊德，以親九族』的政治方略，長期主導了中國的政治觀念，是中國政治學的基本特色。

《尚書》的篇數，據記載先秦時有『百篇』。秦朝焚書，濟南伏生『壁藏之』。漢朝建國，平定天

下，伏生把藏起來的《尚書》找出來，已經殘缺不全了，祇存二十九篇。《史記·儒林列傳》做了這樣的記載，是可信的。但『二十九篇』這個篇數，學術界認為實際上伏生傳的是二十八篇，西漢時河內女子發現了一篇《泰誓》，獻到朝廷，加入進去，成了二十九篇。還有學者認為『二十九篇』是把《顧命》一篇分爲《顧命》《康王之誥》二篇而形成的。伏生在齊魯間傳授《尚書》，朝廷還派晁錯來從伏生學習《尚書》。後來《尚書》成了官學，就通行天下了。伏生的本子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，稱『今文尚書』。漢景帝的兒子劉餘封爲魯王，這位魯王死後謚『共』（即『恭』），歷史上稱『魯共王』。魯共王在景帝前三年（前一五四）受封魯王，據《漢書·景十三王傳》『二十八年薨』，大約卒於武帝元朔二年（前一二七），這一年是漢武帝即位第十四年。魯共王在位期間，爲了擴大宮室，毀壞了孔子宅，結果從壁中發現了『《古文尚書》及《禮記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凡數十篇，皆古字也』。這是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記載。歷史上把這次發現的《尚書》古文本稱『古文尚書』。《古文尚書》較之《今文尚書》多出了十六篇。這就出現了《尚書》今、古文並行的局面。總的情況是，《今文尚書》立於學官，屬於官學。《古文尚書》在民間流傳，祇在王莽當政的短暫時期立於學官。但是西漢學者劉歆，東漢學者杜林、賈逵、馬融、鄭玄都傳《古文尚書》，古文之學逐步興盛，而《今文尚書》在東漢時期反而逐步式微了。在《古文尚書》興盛的東漢，孔壁《古文尚書》較《今文尚書》多出的十六篇沒有流傳下來，應當是失傳了。

東晉元帝時期，豫章內史梅賾向朝廷獻上了孔安國注《古文尚書》五十八篇。這個五十八篇本，有三十三篇與西漢《今文尚書》以及東漢鄭玄注本《古文尚書》篇目同。伏生的《今文尚書》本來二十八篇，《顧命》分出《康王之誥》一篇，成爲二十九篇。梅氏獻上的本子，《堯典》下半爲《舜典》，《皋陶謨》下半爲《益稷》，《盤庚》分爲上中下三篇，加起來就成了三十三篇。這是梅氏獻書以前從漢代傳下來的部分。梅氏獻上的《古文尚書》除了三十三篇與鄭玄注本同，還多出了二十五篇：《大禹謨》《五子之歌》《胤征》《仲虺之誥》《湯誥》《伊訓》《太甲上》《太甲中》《太甲下》《咸有一德》《說命上》《說命中》《說命下》《泰誓上》《泰誓中》《泰誓下》《武成》《旅獒》《微子之命》《蔡仲之命》《周官》《君陳》《畢命》《君牙》《冏命》（參孔穎達《堯典》疏）。這當中的《泰誓》已不是西漢河內女子發現的那篇，而是梅氏獻上的另一個內容不同的篇目。西漢河內女子發現的《泰誓》大約東漢末期失傳了。梅氏所獻《古文尚書》多出的這二十五篇從宋代吳棫開始懷疑是漢代以後人僞撰的，朱熹進一步加以強調，經過元明清學者不斷研究，至清代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、惠棟《古文尚書考》，基本上把二十五篇最後確定爲『僞古文尚書』。乾隆官修的《四庫全書》在《尚書古文疏證》的提要中以官方名義確定了這一結論，並表揚閻若璩『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』。梅氏所獻《古文尚書》五十八篇有西漢孔安國傳（即注），唐代孔穎達《尚書正義》詳細考證了西漢劉向、劉歆，東漢賈逵、馬融、服虔，西晉杜預均『不見孔傳』。他認爲孔傳本《古文尚書》長

期隱而不見，至東晉初梅賾獻上朝廷纔爲世人所知。而宋以來學者則認爲孔傳非西漢孔安國作，乃是大約西晉人所作，託名漢武帝時的孔安國，歷史上稱『僞孔傳』。二十五篇雖然是漢代以後大約魏晉時人作的，但其寫作辦法是廣泛搜羅古書中引述的《尚書》片段以及其他古書的文句，加以連綴，撰寫而成。例如《禮記·緇衣》：『《君雅》曰：「夏日暑雨，小民惟曰怨。資冬祁寒，小民亦惟曰怨。」』梅氏所獻二十五篇中的《君牙》作：『夏暑雨，小民惟曰怨咨。冬祁寒，小民亦惟曰怨咨。』《禮記》的『資』，梅氏所獻《君牙》作『咨』，與上文的『怨』連讀爲『怨咨』。近年出土的戰國楚簡《郭店簡》《上博簡》都有《緇衣》，其文字作『晉冬旨（祁）滄（寒）』。『晉冬』即進入冬天。可見梅氏所獻的《君牙》作『咨』，並且與上文『怨』字連讀爲『怨咨』，是一種誤解。在這種誤解基礎上，把《禮記》的下一句『小民亦惟曰怨』，後面加上一個『咨』字，成爲『小民亦惟曰怨咨』，以便與上一句『小民惟曰怨咨』前後文氣相承。這種加工改造的痕迹還是看得出來的。戰國楚簡《緇衣》給我們的啓發是：《緇衣》引用的《君雅》原作『晉冬』，後來訛作『資冬』，屬於形近之誤。西晉時僞造《君牙》的人又誤以『怨資』連讀，『咨』在《尚書》中常見，《盤庚》有『民咨胥怨』的話，就改爲『怨咨』了。梅氏所獻二十五篇，行文比較流暢明白，孔穎達也有所覺察，他在《尚書正義序》中說：『古文經雖然早出，晚始得行，其辭富而備，其義弘而雅，故復而不厭，久而愈亮。』從進化論的角度看，這當然與韓愈對《尚書》的體會『周誥殷盤，佶屈聱牙』正相反。韓愈指的是三十三篇真

《尚書》的文風，孔穎達指的是二十五篇晚出偽《尚書》的文風。他們的真切體會實際上也被宋人拿來作為劃分真偽的一個界限。

我們對待梅氏所獻《古文尚書》中多出的二十五篇似乎可以這樣認識：某些材料依據舊典，部分篇段結撰典雅，意蘊弘深。關於寓意，宋人特別欣賞的『十六字心法』——『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』，就出自梅氏所獻二十五篇之一的《大禹謨》。學術界曾指出，這精彩的四句有兩個來源：一是《荀子·解蔽》：『故道經曰：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。』二是《論語·堯曰》：『堯曰：咨，爾舜，天之曆數在爾躬。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』《大禹謨》中還有一段明快的大禹誓辭：『濟濟有衆，咸聽朕命。蠢茲有苗，昏迷不恭。侮慢自賢，反道敗德。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。民棄不保，天降之咎。』也可以尋出其來源：一是《墨子·兼愛》：『且不惟泰誓爲然，雖禹誓即亦猶是也。禹曰：濟濟有衆，咸聽朕言。非惟小子，敢行稱亂。蠢茲有苗，用天之罰。』二是《毛詩·隰桑》小序：『小人在位，君子在野。』我們可以發現，經過改寫，呈現出的特點就是明白暢達，讀起來了無障礙，朗朗上口。這就是孔穎達所說的『亮』。主張二十五篇不偽的學者，把這個本末倒過來，認爲《墨子》《荀子》《論語》《毛詩序》《禮記·緇衣》來自二十五篇。祇要靜心閱讀這些文字，誰先誰後，還是可以體會的。至於孔安國注，雖然大約出於西晉人手，但注釋水平應當高於馬融、鄭玄、王肅三家的注。陸德明在南朝撰《經典釋文》，同時見到馬、

鄭、王、孔四家注本，他選擇了孔注，也就是梅氏獻上之本。唐代孔穎達作《尚書正義》，也選擇了孔安國注本。乾隆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認為孔傳『根據古義，非盡無稽』。今天回過頭來看，孔安國注吸收了馬、鄭、王的成果，不少訓詁暗用《爾雅》《說文》《廣雅》，大約是西晉時期《尚書》注本中較好的一種。假如不託名孔安國，那麼地位也不見得低於同時代的杜預。

無論基於哪種原因，從陸德明到孔穎達，梅氏所獻《古文尚書》逐步取代了以往的西漢以來的今、古文《尚書》，成了權威的《尚書》文本。梅氏所獻《古文尚書》摻雜著古體字，唐代衛包奉玄宗之命改成了通行字，唐代刊刻的《開成石經》用的就是衛包改定的經文文本。這個經文文本與後來宋元明清時期的《尚書》經文文本基本一致，所以《開成石經》本算是一個最後的《尚書》定本。這個定本五十八篇，其中三十三篇是漢人傳下來的，二十五篇是魏晉間人撰寫的。傳世的五十八篇文本有偽孔安國注，其中《舜典》的注據《經典釋文》說是用王肅注補入的。

孔穎達等人奉命撰修的《尚書正義》，最初文本祇有正義，也就是疏，沒有孔穎達為之解釋的《尚書》的經文和孔安國注。這種疏的單行本叫『單疏』。北宋國子監刊刻過諸經單疏本，南宋國子監又重刻之。傳世的是南宋國子監本，日本宮內廳藏一部，已經影印出版。這種單疏本閱讀不方便，南宋初年在浙江紹興的兩浙東路茶鹽司陸續編刻了經、注、疏三者俱全的本子，這組本子經文半葉八行，世稱『八行本』。合編的方法是以單疏本為基礎，在各節疏文前添上經文、注文。這

樣，疏文的面貌基本上不變，又添足了經文、注文，是比較理想的辦法。八行本《尚書注疏》在中國失傳了，日本保存了兩部。其中一部在日本足利學校。清代雍正年間，日本學者山井鼎撰寫了一部校勘學巨著《七經孟子考文》，經過物觀增補，刊印成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》。其中對《尚書注疏》進行了詳細校勘，充分利用了足利的那部宋刊八行本。不久，山井鼎的書傳入中國，中國的校勘學家盧文弨利用了山井鼎的成果，對《尚書注疏》進行校勘，取得了很大成就。《四庫全書》也把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》全部錄入。其後阮元的《十三經注疏校勘記》當中的《尚書注疏校勘記》又全面吸收了山井鼎、盧文弨的成果，從而使中國學者間接利用了八行本《尚書注疏》。日本昭和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，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排印出版了倉石武四郎、吉川幸次郎等十二位學者歷時四年之久合作完成的《尚書正義定本》，每卷都附有校勘記。這個定本進一步利用了足利八行本。根據學者的研究，足利八行宋本並非早期印本，而是後來修版刷印本，因修版而造成的錯字，不乏其例。日本收藏的另一部八行本《尚書正義》則在大阪私人手中，光緒間楊守敬訪書日本，重價收歸。這部八行本後來收藏在國家圖書館，《古逸叢書三編》《中華再造善本》先後予以影印。根據影印的楊氏八行宋本，我們通過校勘並對照山井鼎、倉石武四郎等人的校勘記，可以發現，楊本雖與足利本出於同版，但刷印較早，文字訛誤少於足利本，可以說是《尚書》的一大善本。如八行本卷二《堯典》疏第三頁第十三行：『《伊訓》十九、《肆命》二十、《原命》二十一。』《肆命》二字各本

皆同，楊本也是如此，而足利八行本作『伊陟』。山井鼎《考文》指出『肆命』足利八行本作『伊陟』。阮元指出：『鄭玄注本無《伊陟》，宋板非是。』日本《定本》也不以『伊陟』爲是。足利本這一錯誤應當是八行本後印修版之誤，楊本還保存著修版前的面貌。楊本的卷七、卷八、卷十九、卷二十共四卷印本佚去，日本人影鈔補足。影鈔的底本，據日本學者野間文史研究，是日本弘化四年（一八四七）熊本藩時習館模刻足利八行本。

明清以來，學術界使用的《十三經注疏》當中的《尚書注疏》源於宋代又一個文本系統，這一系統也是經、注、疏合本，還加上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，因爲多是正文半葉十行，歷史上稱爲『十行本』。《尚書注疏》傳世最早的宋代合刻的經、注、疏、釋文四者合本，是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宋魏縣尉宅刻九行本《附釋文尚書注疏》，這個珍本臺灣也影印了。元代重刊的十行本《尚書注疏》大體可以斷定來自這個宋九行本。而明代的永樂本、嘉靖李元陽本、萬曆北監本、崇禎毛氏汲古閣本，清代的乾隆武英殿本、嘉慶阮元本，又都源於元十行本。我們心目中的《十三經注疏》實際上就是以阮元刊本爲代表的基本面貌。我們用《尚書注疏》十行本系統的本子與八行本相比較，發現十行本基本上維護了八行本的結構，祇是多了陸德明釋文。問題是，從宋刊九行本到元十行本，它們都是坊刻本，訛文脫字明顯增多。例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刊九行本《說命中》：『惟天聰明，惟聖時憲，惟臣欽若，惟民從乂。』孔傳：『憲，法也。』下面脫注文『言聖王法天以立教，臣敬順而』

奉之，民以從上爲治』二十字，又脫疏文『傳憲法至爲治，正義曰……故從乂也』一段五十一字。總共脫七十一字。元十行本、明永樂本、明李元陽本、明汲古閣本都沿九行本之脫。日本山井鼎指出了這條脫文。阮元刊本從元十行本出，當然也脫這七十一個字，他在校勘記中根據山井鼎的成果指出了脫文。而在宋刊八行本中，這七十一個字是完整無缺的。可以說，宋刊八行本是比较精善的經、注、疏俱全的合刻本。楊守敬從日本購歸的這一部刷印又早於日本足利學校藏本，雖然楊本《古逸叢書三編》《中華再造善本》先後影印過，但都是綫裝本，一般讀者難以購讀使用。現在《國學基本典籍叢刊》影印平裝本，可以讓這部從日本歸來的宋刊八行本《尚書正義》走到尋常讀者的書房案頭，功莫大焉。因述《尚書》流傳刊刻大略，附贅卷前，供讀者參考。不當之處，還請指正。

杜澤遜

二〇一七年九月

據國家圖書館藏宋兩浙東路茶
鹽司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
二厘米寬十六點三厘米